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 国家关系：一种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视角

卢光盛 张 励

【内容提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区域性公共产品成为促进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GMS 国家）区域合作的核心。本文在简要介绍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的基础上，以其为切入点，对 GMS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现状进行剖析，分析其在区域合作中对解决地区危机、塑造地区身份与声誉、促进相互间关系等方面的重要性，并以此为视角来初步探索发展中国与 GMS 国家关系的新思路。

【关键字】后金融危机时代 中国 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 区域性公共产品

【作者简介】卢光盛，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张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GMS）国家关系能否继续深入展开的一个关节点便是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一种，它是指在一定地区范围内由各利益相关方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它对解决地区危机，促进地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关税优惠以及在对外交往中以集体身份来获取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区域性公共产品为切入点，来研究后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与 GMS 国家关系的新问题、新动力与新思路，以期对中国和平外交的发展、周边战略依托的建设有所启示。

一、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及其意义

(一)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概念、分类与特点

公共产品是“每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的物品，^①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国家为所属地区提供统一的行政与法律制度，维护国家内部秩序以及对外安全；第二，现代国家为所属地区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例如全民教育、社会保障、公共设施等；第三，现代国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管理或调节经济。^②公共产品具有两大特点：一是“非支付者的非排他性”，指的是“一旦公共产品形成之后，它的利益或坏处就对所有人有效，换句话说，那些没有为公共产品支付成本的人也不会被排除在对它的消费范围之外”；二是“利益的非竞争性”，指的是“一方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公共产品对其他人的供应，其他人对公共产品的额外消费并不导致成本上升”。

区域性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衍生和分支，它指的是在一定地区范围内由各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按桑德勒的观点，区域性公共产品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从层次来说有国家、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其中又可以划分为纯公共产品(pure public goods)、不纯粹公共产品(impure public goods)、俱乐部公共产品(club public goods)和联合产品(joint products)四种类型。^③它具有三个特点：其一，区域性公共产品有地域限制，其成本通过协商来分摊，从而能够比较有效地防止和排除该产品被“私物化”。从目前各区域合作的现状看，除特定区域外，一般不存在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即使在一些大国占主导的区域合作中，由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存在，也没有哪个国家(即使它是主导性的大国)可以获得毫无顾忌行事的特权。其二，由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涵盖范围较小，各国从中得到的收益和必须付出的成本比较清晰，从而能避免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中普遍存在的“免费搭车”现象。其三，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优势还在于它能更直接地反映本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的需求，从而使其机制和制度更切合该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需要。^④

^① Paul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XXXXVI(1954), pp.387-389.

^② Paul Hirst &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p.174.

^③ Daniel G. Arce M. and Todd Sandler, *Regional Public Goods: Typologies, Provision, financing,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Stockholm: Almqvist & Wikesll International, 2002, p.17.

^④ 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观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11-12页。

(二)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用、分配及本源性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来源主要有三个：第一，主导地区合作的国家行为体。第二，地区内外的非国家行为体。第三，地区合作组织本身。在供给过程中可能出现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偏好来决定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并使其他成员国的“投票”无效的情况，这将加剧区域内公共产品供给不畅，导致成员国间合作欲望消减，对领导国信任缺失，阻碍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效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直接效用方面，即地区区域性公共产品能帮助各参与方以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方式来应对和解决地区内的“市场缺失”和地区合作中的“囚徒困境”等问题。其次是间接效用方面，具体表现为在地区公共产品的形成过程中，各行为体通过常规性讨价还价，形成了更有效、更经济的合作方式，增加了各自政策的互动性与透明度，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塑造了区域一致的地区身份和声音，并在与区外行为体的交往中以一个集体身份来获取利益。

在分配上，尽管纯粹的公共产品有着“利益的非排他性”的特征，但在非纯粹的、俱乐部式公共产品甚至在联合(双边)产品中，都存在利益分配的问题。在正常情况下，各方的收益与付出应该是相对应的。但存在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即在一体化过程中，有些成员甚至于有些区外行为体(outside player)会付出明显高于自己获益的成本，来促成某种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在这种情况下，收益与付出显然是不对应的，但是将这个现象放置到更为宏观的、长远的历史角度看，最终成本和收益还是能基本保持一致的。此外，在本源性上，一国内的公共产品本源为税收，政府通过强制力向公众征税，为百姓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而在区域合作中，由于缺乏具有领导力的联合政府，因此不可能向各成员国强制“征税”，公共产品的本源开始转变为由区域内的主导国通过其所拥有的巨大经济剩余价值来提供生产区域内所需的公共产品的高额成本。这便要求主导国在保证本国经济健康运行下，具备足够的剩余价值。因此，区域性公共产品本源性的实质便是领导国通过付出一定的代价来换取周边的安全稳定及本国的国际声望等。

(三) 以区域性公共产品来研究中国与GMS国家关系的意义

从对区域一体化的理论探索上来看，无论是经济学领域的垂直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理论，还是政治学领域的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都未能在经济

与政治一体化之间架起桥梁。但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却能清晰地剖析区域一体化的经济与政治元素，因而以区域性公共产品为媒介才能全面地探究中国与 GMS 国家发展关系。

从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来看，金融风暴使 GMS 内公共产品产量减少，但对其需求反而增加，这便形成了“拐点机遇”。即中国在危机中通过提供有效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使 GMS 国家在经济上减少损失、在心理上获得信心、激起对生产公共产品的兴趣。因而区域性公共产品成为打破旧有合作瓶颈，建立新合作机制的关键点。

对中国与 GMS 国家而言，以区域性公共产品为媒介，可以在 GMS 内建立起战略依托，形成自主寻求解决区域性问题的方法；可以促成谈判效率的提高，缓解社会民族矛盾；可以使区域内国家以集体行为的方式改变它们在国际系统中被动的地位。因此，从区域性公共产品入手，能更为有效地分析中国与 GMS 国家的关系并为其提供对策。

二、区域性公共产品缺失是影响中国与 GMS 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因

在全球化与地区化并行，区域合作亮点逐渐凸显的时代，地区成为全球治理当中一个日益重要的节点。区域性公共产品则成为地区一体化发展能否顺畅，合作是否会受制的一个要穴。

（一）中国与 GMS 国家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现状

中国与 GMS 国家公共产品合作内容主要基于桑德勒提出的纯公共产品、不纯粹公共产品、俱乐部公共产品及联动产品四种，其中以俱乐部产品为主。这些区域性公共产品使两者形成了政治抱团、经济密织的形态，但其抱的程度与密的程度有待商榷。中国与 GMS 国家形成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主要包括：第一，地区内对话渠道、合作机制的创设，为区域内各国提供了讨价还价的常规性途径，为各方搭建了常规的、更为经济的交往渠道，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第二，在次区域内通过各国合作，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灌水优惠、贸易便利化、投资优惠安排、环境、卫生、教育、禁毒等方面的可观成果；第三，次区域合作所带来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对外形象及以此开展的对外合作。（参见表 1）

表 1 GMS 的地区公共产品

溢出范围	纯粹的公共产品	不纯粹的公共产品	俱乐部式的公共产品	联合产品
地区的	对话合作机制； 对外整体身份与形象； 环境保护； 流域治理	基础设置； 交通网络（航空网络，泛亚铁路）； 禁毒合作；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	交通网络（昆曼公路、湄公河航道疏浚）； 电力网络； 人力资源开发； 贸易便利化； 跨境经济合作区； 反人口走私、反洗钱	区域内成员间双边的合作成果（如中国云南分别与越南、老挝和泰国北部的合作机制）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二）中国与 GMS 国家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缺陷

尽管中国与 GMS 国家形成了地区内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并且它起到了对内解决地区危机，对外塑造地区身份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仍存在着缺陷。具体表现为：其一，公共产品外溢不够。从表 1 可以看出，中国与 GMS 国家具体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主要集中在俱乐部产品，这说明其外溢有限，外部支持不大。其二，区域性产品供给不足，不能满足本地区治理需求。这主要是因为部分国家受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及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在讨价还价过程中难以提供必要的“对价”筹码，因而只能免费搭车。其三，在区域公共产品合法性方面，主权让渡带来的合法性延承不够。在 GMS 地区合作中，云南和广西地方政府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参与合作，并提供了大部分的区域公共产品，但由于中央主权让渡的有限，大大限制了相互间的交流，并使区域公共产品的合法性主要依托于公共产品的绩效水平。其四，区域内公共产品生产易受危机传导影响。金融危机浪潮对 GMS 国家的冲击，减缓了 GMS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生产进程，使得原本就供给不足的局面进一步恶化。这说明 GMS 内部公共产品的生产不稳定、持续性不强，易受外界环境干扰，这主要与区域合作时间尚短以及成员国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有关。

（三）中国与 GMS 国家合作中区域性公共产品缺失的原因

中国与 GMS 国家公共产品的缺失既受客观因素的限制也受主观因素的制约，这使得区域合作发展步履维艰，完善程度不尽人意。首先，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博弈，使主权让渡不够。尽管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参与区域化合作，但二者所追求的利益侧重点存在差别。一般而言，中央把政治安全绩效放在首位，而地方政府则更多地从经济利益来考量，这使得公共产品的合法性传承不足，产品种类也不完善，不利于公共产品供给。其次，在区域合作中，领导者不明，导致公共产品供给困难。在一国区域范围内，由于有领导者的牵引和推动，加之强制力的辅助，政府能最大化地利用各种资源，发挥国家公共产品的最大作用。而在区域合作中，领导者的缺乏导致资源不能得到更为有效、合理的利用，加之强制力无法施用，所以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困难。第三，中国与 GMS 国家发展水平的不对称性。其一，两者在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资金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异质性。其二，信息不对称将双方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就使公共产品中“免费搭车”现象极易出现。第四，没有形成制度自主性。中国与 GMS 国家的合作以中央为主导，缺失“新地区主义”市场导向作用。参与方不同意让渡主权，也不愿建立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使区域公共产品发展缓慢。第五，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不足。首先，区域内公共产品的生产需要足量的剩余价值成本，但在 GMS 区域合作中没有哪一个国家可独自承担这份成本，缺乏独木可支的角色。其次，在独木难支的情况下，便要求每一个成员国能提供足够的剩余价值以继续公共产品的生产。但由于有些成员国不买票、少买票或者没能力买票的现状使得搭便车现象普遍，生产成本不足，直接导致区域性公共产品数量缺乏、质量较低。

三、中国以区域性公共产品为策略媒介发展同 GMS 国家的关系

GMS 合作是反复完善的循环过程。即从对区域内现状、发展缺陷和可以改善的能力出发，通过集体成员的探讨形成新区域性公共产品，然后经成员国因素、发展模式、媒介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新公共产品所带来的相应的利益与成效，同时对国家关系与 GMS 发展程度产生直接影响，最终再反过来进行

新的循环，起到不断提高区域合作程度的作用（参见图）。在此，将 GMS 国家因素设为不变的常量，着重从中国对 GMS 国家的视角出发，用区域公共产品作为关联点来探索两者互动关系的新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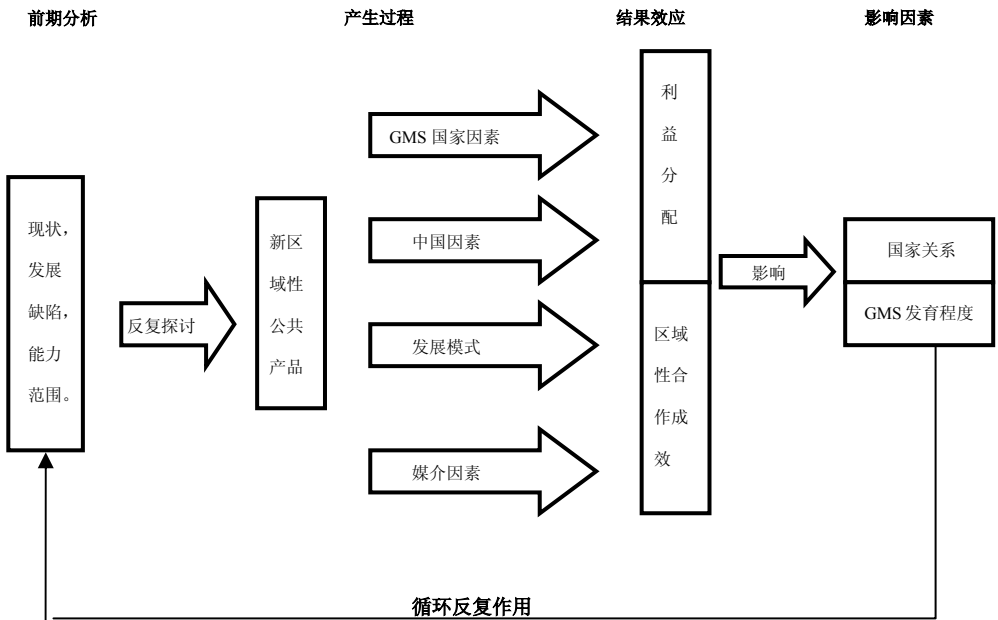


图 以区域性公共产品为媒介的区域合作互动过程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一）GMS 需要什么样的公共产品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应量和有效性决定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进度以及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中国与 GMS 国家合作生产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主要有以构建地区稳定为核心的政治安全、以地区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合作和以构建和谐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文化三大类别，同时又向下衍生出了具体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参见表 2）。

表 2 GMS 区域性公共产品类别

类别	领域		例子
安 全 (以地区稳定为核心)	传统安全方面	内部冲突	区域成员国在缅甸问题、南海问题等问题上的利益争端与不同立场。
		外在威胁	对于区外国家(例如美国、日本、东盟、印度等)的感知和认识。
		互信问题	政治上互信不足, GMS 国家希望减少中国在 GMS 区域发展中的影响。
	非传统安全方面	公共卫生	边境艾滋病、疟疾、禽流感防控、技术人员的培训、召开卫生论坛。
		跨境犯罪	跨境毒品走私、军火倒卖、人口贩卖、边境洗钱等犯罪问题严重。
		环境与气候问题	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红河流域等主要流域建立防护林体系控制水土流失, 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
经 济 (以地区发展为核心)	经济主体方面	贸易和投资	自由贸易区, 边境交易市场, 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办厂, 双边投资协议签订。
		金融与货币	针对东南亚地区国家, 在云南和广西建立人民币结算试点; 金融市场规范; 区域性货币。
	经济副翼方面	援 助	柬缅境内路段勘探; 老纳堆至巴蒙公路北段修复; 柬首相府办公

			楼修建。
		基础设施建设	昆曼公路建设、电信信息高速公路修建、“网对网”的电力合作、邮政。
社会-文化 (以构建和谐关系为基础)	社会发展方面	移民问题	对边境移民的正常管理与疏导、对非法移民的防范、移民安全性问题。
		跨境民族	跨境民族的融合、跨境民族合作、跨境民族管理、跨境民族文化交流。
	文化促进方面	集体认同	文化溯源探讨，民间团体互访，以文化节为载体的双边活动交流。
		教育文化	各种类别教育交流，学历学位互认，扩大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名额。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首先，三大类区域性公共产品是交叉作用、相互促进与制约的。在政治安全因素中，内部冲突、互信问题和传统问题的解决，以及在对外威胁上达成共识，能增强 GMS 区域的和合性和集体效应，创造有利于 GMS 区域发展的国际环境，这对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也起到保护伞的作用。在经济发展因素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为区域性公共产品生产跨出了赋有意义的第一步，它使 GMS 区域内单个国家能够通过集体行动减少提供公共产品的费用。而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实施使该区域交换货币趋同化，加大了区域间的统一性和合作力度。同时双边投资协议的签订，道路、通讯、能源设施的建设，为进一步达成政治和文化共识起到了推动作用。在社会文化建设上，由于多宗教、多文化以及发展程度的异质性使得文化区域性公共产品显得极为重要。移民管理

站点的设立,跨境民族合作的加强和来华留学规模的扩大等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建立,能增进彼此的感情,加强文化认同,从精神层面达到整合的目的,为区域合作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助力。

其次,区域性公共产品推动的区域合作不能只着眼于短期的经济利益,需要综合全面衡量问题,增强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外溢性并发挥其对外辐射效应。区域性公共产品能在贸易互惠、经济共赢、地区危机的化解以及对外事务立场认同等方面带来较为可观的利益,且随着合作的进一步加深,其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会更为凸显。例如,中国可以构建起以 GMS 为战略依托的纵深带,执行和平发展和睦邻周边的政策;GMS 国家能借助中国的政治、经济、技术实力来提高本国的综合实力,增强对抗性。此外,在区域合作中要注意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的关系,这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有重要影响。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选择以政治安全还是经济收益为出发点上的观点不同,两者在区域合作及区域性产品上会产生分歧,继而影响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这便要求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对次中央政府(即对外区域交流的主要城市)进行主权让渡。

(二) 如何为 GMS 提供公共产品

GMS 区域内各国发展水平不一,需要类别多元化与供给范围广泛化的公共产品,这便导致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无力主导公共产品的生产,而必须要借助成员国之间的互动及外界媒介的推动,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应把握合作制定重塑、区域机制转型的拐点机遇,形成以中国为主动力、GMS 国家为次动力、亚洲开发银行为刺激点的发展模式和具有针对性、优势性、复合式、渐进式等特点的供给途径。

1. 由谁提供?

第一,在 GMS 区域合作中,中国是区域性产品的主动力和最大的供给者。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条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中国经济发展有条不紊,在受到冲击后迅速调整,恢复较快,经济实力坚挺。同时又如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一样对相关的 GMS 国家进行了援助,成为 GMS 区域合作持续发展的信心支柱和主要动力。其次,中国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对外贸易、合作、交流市场上具有单一性、包容性能起到兼容并蓄的作用。又由于其自身经济发展较快,因此在 GMS 区域中成为香饽饽。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零关税的促进更使中国因素在 GMS 区域中作用增大。最后，中国的经济、技术水平高于 GMS 区域内的其他成员国的客观事实，中国负责任邻国的对外形象和睦邻友好的政策，以及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大于 GMS 国家的客观情况，使中国在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生产中成为了主力军。

第二，在 GMS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中，GMS 国家为次动力。其一，GMS 国家参与区域内合作是必须的，因为它能提高本国参与对外事务的积极性，同时能在公共产品生产决策中提出有利于本国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生产建议。其二，GMS 国家参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生产，有助于避免免费搭车现象的出现，缓解其他成员国的生产成本与压力，促进相互间的良性合作，保持生产积极性。其三，在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次动力地位受一国发展水平的制约。在与中国的合作过程中，由于技术条件、资金等方面受到限制，以及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GMS 国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极大制约了其推动区域内公共产品生产的作用。

第三，亚洲开发银行在 GMS 区域性公共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刺激作用。首先，亚洲开发银行作为 GMS 合作的倡导者，在 GMS 成长中提供了较多的机遇与辅助。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国际协议和强制机制，保证了区域性公共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公平性。其次，亚洲开发银行的介入加强了处于不利地位的经济体的整合，为中国和 GMS 国家提供了支持，使其在各项经济、技术合作中，加深了彼此关系，同时使离散的经济体在获得额外援助后，有效地参与到次区域合作进程中。

2. 如何提供？

在 GMS 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针对性的发展战略。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制定针对性的发展模式。首先，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区域性公共产品更具魅力。如果说“免费搭车”是非金融危机下的一种阻碍，那么在当前危机尾期便是一个机遇。中国首先应针对性地生产有助于恢复区域整体水平的公共产品，充分发挥“免费搭车”的效用，让其他成员国上车享受，弥补它们的经济损失、医治它们的心理创伤，加深彼此信任和地区整合性。其次，激起 GMS 成员国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热情。公共产品在危机中的莫大作用，使 GMS 国家能对其产生更大的兴趣，以超于常规背景（即非金融危机时代）下的发展速度来推动国家间关系和区域整体发育程度。这便自

然对建设中国战略依托也有着莫大的帮助。

其二，优势性的“最佳表现”(Best-shot technology)策略。最佳表现是指公共产品整体层次是由作出最大贡献的行为者决定的。在GMS所有成员国中，中国是最具有潜力成为最大贡献者人选的国家。因此，首先，在区域公共产品生产过程中，中国应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为基础，促进政治安全为保障，提高科技文化水平为推动，加强民间互动为补充，同时运用自身在政治安全、经济水平、科学技术上的“比较优势”提高区域内公共产品的整体质量和产量。其次，在处理区域内公共产品生产和分配问题时，中国应以有利于GMS整体发展为基本准则，适当地进行让渡。在危机时期，中国应给予处于困境中的成员国免费车票。最后，GMS作为整体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中国应先努力促进相互间的互信，达成共识，在与其他非成员国和组织的合作中积极维护GMS的整体利益。

其三，复合式的依存策略。首先在生产区域性公共产品中要改变国家对相对收益优于共同收益的看法和认为成员国间合作是“你之所得即我之所失”的零和博弈的观念。因为在生产区域性公共产品过程中，GMS成员国间是相互复合依存的，利益更是息息相关。因此，成员国个体在关注相对收益的同时也应关注共同收益，这样才能推动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获得双赢。其次，要从依附性转为复合相依。在区域合作初期，由于成员国间整体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中国应大力生产以地区发展为核心的经济类区域性公共产品，促进区域内整体实力的提高。在合作中后期应采用复合式状态，各成员国共同参与技术、文化、安全等公共产品的生产，减少甚至消除“免费搭车”现象，一同应对外来危机。

其四，渐进式的磋商机制。在GMS区域内，存在着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性，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一蹴而就。首先，在生产与分配区域内公共产品过程中，需要各个成员国反复协商取得一致意见，获取共需的公共产品。其次，建立、完善对话机制，定期召开会谈，对效用不明显的公共产品进行修改。第三，加强区域内磋商机制的约束力和强制力，使得会谈效果更为明显，公共产品更为有效，以有效避免诸如缅甸问题、南海问题等区域内的矛盾的激化。

(三) 两个相关的问题

1. 应注重区域内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这要从两个角度来观察,从生产供给角度来讲,在区域性公共产品生产过程中,中国与GMS国家都应积极参与,避免出现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局面和免费搭车的窘境。从分配角度来看,要根据投入比来划分最终的利益分配(因其最初制定时候就按区域内总需求量和各国投入比来划分),避免公共产品私物化现象。两者间的平衡可以靠有效的机制来进行约束,同时中国也适当对GMS国家施以分配上的援助。

2. 应注重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合法性、效用性与可持续性。在GMS公共产品生产前,要首先确认其“合法性”的支点。区域性公共产品在主权没有赋予其“自然的”合法性的先天缺失情况下,通过后天改造得以承认,参与地区合作的国家行为体才能进行主权让渡,非国家行为体才能得到授权参与合作、提供资源,而一体化进程的组织本身也才可能获得存在的正当性。^①其次,要注重效用性,所生产的公共产品要起到解决GMS区域内贸易合作、金融改善、危机解决、对外塑造地区身份的功效。再次,要注重可持续性,使GMS公共产品能持续有效地促进区域内机制的完善和合作的加深。三者以“合法性”为前提,以“效用性”为目的,以“可持续性”为发展动力,相互交错影响。

四、结论

在错综复杂的后金融危机时代,GMS较为成功的合作模式成为次区域合作发展的聚焦点和其他次区域合作的模范点。中国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能否维持这种趋势,深入发展在各领域的关系,关键在于区域性公共产品能否得到有效供给。此外,中国与GMS国家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内容是否完善、平台是否健全,安全保护机制是否有效,也都将深深地影响着GMS未来的发展态势和中国周边战略依托的建设。

^① 卢光盛:“地区公共产品分析——以GMS为例”,《国际公共产品与地区合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2页。

G20 Mechanization and Issue-construction

FANG Jin

The financial crisis stemmed from U.S. caused the gravest post-war economic decline, which fully reflected the deficiency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China should choose G20 as the first mechanism fo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for G20 is highly legitimate as a mechanism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China should actively push for the mechanization of G20 and gradually shift the issues concerned to G20 from the financial area to all the paramount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urn G20 swiftly into a primary global governance mechanism in the domai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Agenda-setting on the Models for Global Governance

ZHAO Long

With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global issues and agenda have mad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wer structure. With new issues continuing to show up, global governance, as the major instrument for solving global issues, is also evolving with new developments and models into a momentous force promoting multi-polarization of the world,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mmon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current changes in global governance models from a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addressing issue development and agenda-setting in relation to each other. The analysis is aim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ideas fo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a reasonable and appropriate role for China to assume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transit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China and GMS Countries in the Post-Financial Crisis Era: A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Public Goods

LU Guangsheng and ZHANG Li

In the post-financial crisis era, the regional public goods is key to promote China's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of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GMS). This essay has outlined the theory of regional public goods and on whose basis examined the

status quo of the GMS regional public goods, analy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public goods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ddressing regional crises, shaping regional identity and pushing for inter-state relations, and the essay has explored new ways of developing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GMS.

New Developments in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From Peace Maintenance to Peace Building

XUE Lei

In the wake of the Cold War, the civil wars and state of anarchy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a major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s a glob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e United Nations has great responsibility in tackling these new threats and challenge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ce,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as the three Pillars of UN, the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commanded and organized by the UN have developed into a unique global partnership, which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loser contacts among the UN principal organs, regional organizations, stake-holding countries, and non-governmental groups. The enforcement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lso needs the strategic planning which is more comprehensive and long-term oriented. As one of th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China needs to respond appropriately to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ake greater participation into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o a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UN's role in maintaining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Coordination Regime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Relief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Relief In Haiti Earthquake As A Case

YANG Kai

We must work together to deal with humanitarian problems caused by natural or man-made factors in the world. In humanitarian crisis, rescue effects will depend on the extent of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Good coordination regime can help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integrate various forces,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eliminate the internal frictions, and minimize the losses caused by disasters. In this paper, we take humanitarian relief operations in Haiti earthquake disaster as a case to analyze the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regime. It is concluded